上海近代公园的纪念意义转变与空间重塑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Commemorative Significance in Shanghai Modern Parks

麦璐茵[1] 周向频[1*] 陈路平[2]
MAI Luyin[1] ZHOU Xiangpin[1*] CHEN Luping[2]

（1.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2.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杭州 310000）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92; 2. Zhejiang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esign Institute, Hangzhou, China, 310000）

文章编号：1000-0283(2022)10-0052-09
DOI：10.12193/j.laing.2022.10.0052.007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2-08-10
修回日期：2022-09-08

摘 要

从纪念的根本内涵出发，运用阿洛伊斯·里格尔“有意为之的纪念物”和“历史纪念物”的概念进行阐发，通过分析上海近代公园中的纪念性空间，比较两种空间类型的产生、优劣以及相互转换，解读其在保护更新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符号性纪念意义”和“本体性纪念意义”，界定并辨析两种意义在公园变迁中的形成及特点。以复兴公园和霍山公园为例，分析设计方案的前后变化及原因、设计意图与实际操作的差异等内容，论述两种意义在具体更新中的转变和重塑空间的过程。两种意义的区分和解读既可以拓展“纪念”在历史公园保护和更新中的作用，也能帮助厘清公园中值得保护和更新活化的内容。历史公园作为一种历史公共空间，记录着社会群体的集体造园历史和使用公园的痕迹，这种记录帮助后人构建起对公园的历史认识，于是产生了本体性意义；历史公园同时也延续着历史上的人、事、社会生活的记忆，为了满足人们延续记忆的精神需求而产生符号性意义，两种意义在公园中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在公园更新中强化符号意义可以增强人们对公园的记忆，但同时应该保存物质本体作为历史延续的稳定基础；而在强调物质保存的个案中，不能陷入固定和僵化，应该积极挖掘本体潜存的符号纪念意义，激发公园活力和新的纪念空间的诞生。

关键词

纪念意义；历史公园；阿洛伊斯·里格尔；保护更新；上海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 of commemoration,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 monuments”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Alois Riegl is used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monumental spaces in Shanghai’s modern parks, comparing the emergence,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interconversion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types, interpreting their “symbolic commemorative significance” and “ontological commemorative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and defining and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formation. Taking Fuxing Park and Huoshan Park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project process, the difference and reasons between the design intention and the actual operation, and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significance in the specif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pacial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istin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significance can expand the role of commemoration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al parks and further understand and clarify the contents worthy of conservation, renewal, and activation. As a kind of historical public space, historical parks record the collective history of social groups in the creation of parks and the traces of their use, and this record helps future generations to build up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parks, thus giving rise to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historical parks also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people, events and social life in history, generating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satisfy this spiritual need. The two significance are inseparable and complementary in the park. Strengthening symbolic significance can enhance people’s memory of the park,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material ontology should be preserved as a stable foundation for historical continuation; while in cases where material preservation is emphasized, it should not fall into fixation and rigidity, and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commemorative significance from material histor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park and the birth of new commemorative spaces.

Keywords

commemorative significance; historical park; Alois Riegl;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Shanghai

麦璐茵
1989年生／女／广东佛山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

周向频
1967年生／男／福建福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陈路平
1994年生／女／浙江绍兴人／硕士／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景观遗产保护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zhouxpmail@sina.com

近代公园具有其区别于古典园林的特殊文化遗产价值，其保护在今天也已成为共识。但是近代公园作为历史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活跃在公众生活中，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顺应不同代人的需求。那么如何保证其特殊历史价值不在更新中被磨灭，又该如何更新才能在保护历史的同时获得持续的发展和活力？两者的平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之所以研究上海近代公园[①]中的纪念性空间，是因为在梳理公园历史时，发现纪念性空间对于公园历史价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纪念性空间在历史公园的背景下也得到了概念的拓展，“纪念”能否成为未来保护和发展决策的一个认识基础，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1 “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与“历史纪念空间”

纪念是指对特定人、事物的回溯与再现，在群体回忆的语境下往往呈现出社会性特点，并借由各类物质载体关联和强化精神内涵，促使怀念的情感得到延续乃至不朽[1-3]。纪念性投射于空间形成纪念性景观、纪念性场所、纪念性建筑等对象。

从19世纪始，国外学者就基于建筑学、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展开对纪念性空间的研究。早期作品多采用古典的轴线对称形式，强调中心性和秩序性；随着20世纪70年代罗斯福纪念园建成，景观叙事被更多应用在纪念空间的设计中，强调空间体验、场所感和文脉延续的重要作用[4]，近十余年间，更是产生了“反纪念碑性”理论与实践[5]。

国内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谭垣[6]、齐康[7]等学者奠定了相关理论基础。后续学者多从宏观规划、区域性设计、单体设计入手，探讨意境营造，或从空间构成、要素叠加、情感表达和动静流线角度探讨更为灵活的纪念性空间叙事营造[8-10]。纪念性空间的内涵和形式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在人文主义思潮、当代新材料与技术发展影响下，研究重点与形式偏好也逐渐从宏大叙事转变为日常性、多元化的场所体验[11-13]，说明被群体或社会视为纪念的对象得到了拓展。

对遗产保护对象的认识也有相似的过程，从关注重要人物、事件的相关遗产，走向更普遍的、社会面的、跟日常生活相关的遗产。同时，“人们认识到遗产需要保护不是因为其过去的价值、功能或意义，而是其今天可以传达给人的，今后可以流传下去的信息和象征意义”[14]。需要注意的是，物质本体是承载这些信息与意义的重要条件，所以不能只保留信息和意义而舍弃物质本体。

从字义出发，纪念可以理解为对信息的记录和不断回想[②]，恰恰契合了当下遗产保护对物质（信息记录—保存下来）和精神（信息传播—存活下去）的双重需求。同样的，持续更新以保持活性是历史公园保护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也是历史公园面临保护时无法单纯进行固定和保存的原因。

在这样的趋势下，阿洛伊斯·里格尔提出的“有意为之的纪念物”和“历史纪念物”[15]两个概念被再次解读[14,16]，并应用在历史公园的保护更新研究中。“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对应里格尔的“有意为之的纪念物”，这些纪念空间都是因为人的纪念目的形成的。“历史纪念空间”对应的是里格尔提出的“历史纪念物”，与“有意为之的纪念物”不同，纪念的是“其物质本体所能证明的一切”[16]，其意义来自于本身及其所经历的历史。

从纪念空间产生的原因来看，“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是先有了纪念的社会精神需求，当这种需求固定下来形成仪式和活动，就有了对相应物质空间的需要，即将精神内涵与新建的或已有的物质空间进行关联产生纪念空间。“历史纪念空间”则是经过时间沉淀后，人因生产生活而建造的物质空间成为人类文明成果，引发后人怀念的情感[7]，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纪念意义。简而言之，前者是因为纪念意义而产生特定的空间，后者是在不特定的空间中产生了历史纪念意义。

以上两类纪念空间，在具体的对象上涵盖纪念建筑、园林、广场等一系列空间，上海近代公园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和“历史纪念空间”统计如表1。

2 纪念意义：“符号性纪念意义”与“本体性纪念意义”

将两类纪念性空间所具备的精神内涵概括为纪念意义，借用陆地的“符号性”与“本体性”的概念[16]进行阐释：将“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中人类为纪念人或事而赋予物质空间的文化或社会意义称为“符号性纪念意义”，强调纪念情感凝结成象征符号加诸于物质本体的特征；将“历史纪念空间”中物质本体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而产生的意义，称为“本体性纪念意义”，强调物质本体自身具备让人认知历史的作用（后文简称“符号性意义”与“本体性意义”）。

“符号性意义”理解的关键是该“意义”外在于物质本体、依靠“人”对附加信息的

① 上海近代公园指建成于1840到1949年之间，一直作为城市公园或后来作为城市公园开放的园林。包括鲁迅公园、中山公园、复兴公园、霍山公园，闸北公园、桂林公园等。
② 《说文解字》：纪，“别丝也，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记，“疏也，谓分疏而识之也”。纪和记都有条缕分辨清晰并标记的意思。念，“常思也”。

表1 上海近代公园中的“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和“历史纪念空间”以及相应的受保护内容

Tab. 1 Intentional commemorative space and historical commemorative space and their protected objects in shanghai modern parks

公园名称 Parks	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 Intentional commemorative space	历史纪念空间 Historical commemorative space	受保护内容 Protected objects	历史名园 Historic garden and park
鲁迅公园	鲁迅墓、鲁迅纪念馆、鲁迅纪念亭、梅园（含梅亭、纪念尹奉吉）、友好纪念钟、裴多菲雕像	假山、水体、园门、桥、沙滤水器、亭、水榭、古树名木、部分植被	鲁迅墓、公园整体范围（靶子场公园旧址，含沙滤水器）、梅园（虹口公园爆炸事件遗址、纪念尹奉吉）	是
复兴公园	马恩雕像广场	假山、水体、玫瑰园、大草坪、沉床花坛、水榭、园门	公园整体，特别是玫瑰园、大草坪、沉床花坛、水榭	是
中山公园	肖邦雕像、大铜钟	大理石亭、旱桥、香花桥、月季园、牡丹园、温室、大草坪、后园门、鸳鸯湖、山水园、荷花池	大理石亭、香花桥	是
闸北公园	宋教仁墓、钱氏宗祠	宋教仁墓、钱氏宗祠、基督教徒墓园门房、徐氏宅砖雕门楼	宋教仁墓、钱氏宗祠、基督教徒墓园门房、徐氏宅砖雕门楼	否
霍山公园	犹太难民纪念碑、犹太难民纪念馆（后来置换成其他功能）		公园整体范围（司德来公园旧址）	否
桂林公园		公园整体，包括四教厅、颐亭、般若舫、双桥、观音阁、假山等	公园局部（黄家花园旧址）	是
漕溪公园	聂屏亭、五二零运动被捕学生关押地遗址	门楼、韫碧亭、倚望亭、聂屏亭、牡丹园、假山、园池、石桥		否
复兴岛公园	白庐	白庐	白庐	否

注：表格内容出自参考文献[17]-[22]。

解读与共鸣才能成立，随着人和文化的变迁，相应的意义也随之转变或消失[16]。如闸北公园的宋教仁墓和雕像，是人们追忆这一历史人物的场所，但是如果没有墓碑、雕塑上的文字、相关的历史记录以及口口相传的历史，仅有陵墓建筑、雕塑和墓园景观，若干代之后其纪念意图和功能将难以延续。墓园自建成至今，虽经历过损毁和修复、公园改造等过程，但最初的纪念意图依然完好保存，说明其符号性意义在不同代际之间得到了认同和延续。

“本体性意义”关键是该“意义内在于其物质本体”，人“通过研究其本体本身，揭示其所见证的史实”[16]，形成对历史的认知，这种“意义”才能够被识别。例如上海鲁迅公园的英式沙滤水器，整体保存较完好，虽然水管已锈蚀不能使用，但它依然成为市民游客怀旧、追忆过去的标志性景点[23]。其本身附带的历史信息包括具有近代特征和英式外观的设计和建造工艺，以及过去80多年的历史痕迹。这些历史为人们所认知，使它具备了本体性意义。

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和历史纪念空间在一定条件下也会相互转换，是“符号性意义”和“本体性意义”对纪念空间的叠加作用造成的。一方面，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在时间积累下，除了原有的符号性纪念意义以外，其物质实体也成为了具有纪念意义的一部分，产生的本体性意义促使纪念空间获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保护动机。如鲁迅公园中以鲁迅为中心的系列纪念空间，在建成时就具备了以“鲁迅”为核心符号的纪念意义。鲁迅墓、雕像、纪念亭、纪念馆在几十年间保持整体格局与硬质构筑不变，虽然植被的视觉效果上有所变化，导致鲁迅墓—铜像—纪念亭的视线关系被掩盖弱化，但并未影响对鲁迅的纪念意义。这充分体现了以“符号性纪念意义”为主导的纪念性空间的特点，即可以在不影响纪念意义的表达和传播基础上，对物质实体进行一定变化（图1）。在60多年后回视这组纪念性空间的建造，可以看到1950-1960年代对现代纪念空间规划设计的探索[24]，体现在山水格局营造、建筑设计、植物配置等方面。虹口公园改造成鲁迅公园的过程是中国园林艺术与现代公园规划、地域民居营建与现代建筑设计的结合，完好保存的物质实体为后人认知这段历史提供了实证证据，使之具备了符号性与本体性的双重内涵。

另一方面，获得社会认同后的历史纪念空间，其本体性意义可能会逐步凝固成新的符号性意义，说明其重要性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因此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和保护力度；但也可能会因为人们对符号性意义的过分关注，使之与物质本体脱离，在人为强化符号性意义的同时改变物质空间，反而使其本体受到破坏[26]（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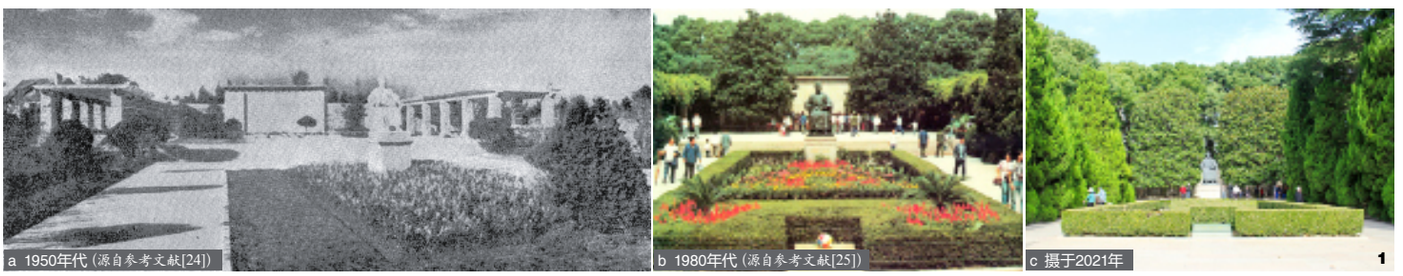

图1 鲁迅墓
Fig. 1 Tomb of Lu Xun

表2 “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与“历史纪念空间”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intentional commemorative space and historical commemorative space

	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 Intentional commemorative space	案例：鲁迅公园中的鲁迅纪念空间 Case: Lu Xun commemorative space in Lu Xun Park	历史纪念空间 Historical commemorative space	案例：复兴公园 Case: Fuxing Park
产生的过程	纪念的精神需求（符号性纪念意义）→纪念仪式和活动→相应物质空间=纪念性空间	纪念鲁迅（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谒墓、纪念活动、展览活动→以鲁迅为主题的纪念轴线和系列建筑	人类建造的物质空间+时间→历史的物证→触发怀念历史的情感（本体性纪念意义）=纪念性空间	建设于近代的复兴公园+持续使用至今→上海近现代城市生活的物证→公众追忆往昔的重要场所
纪念的对象	特定的人、事件	鲁迅	一段时间/历史	近现代上海城市生活和公园历史
优势	只要符号性意义存在，无论物质空间如何变化，纪念性空间就有生命力	鲁迅墓建成后不久就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行政措施上得到强制保护，除了植物发生较大变化以外，其他保持不变，公众对鲁迅的纪念情感依然保持	只要物质空间能够保存下来，本体性意义就会一直存在	只有保护复兴公园的物质实体，保持法式园林与中式园林独立又融合的状态，其对于后世认知这段历史的意义才能延续
弱点	一旦纪念意义不存，纪念性空间也随之消亡	—	物质空间发生变化，本体性历史意义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失	为了满足设施更新、植被更换、功能替换、审美变化等需求，复兴公园物质本体面临改变、增减
两种空间类型的转换	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时间→符号性纪念意义+本体性纪念意义→两类兼顾的纪念性空间→在精神和物质上得到双重保护	1956年竣工的鲁迅纪念系列建筑和景观，至今依然以“鲁迅”为其最重要的符号+保存完好的鲁迅纪念空间为今天研究50-60年代的园林、建筑、文化历史提供了样本→具备了符号性意义与本体性意义的双重内涵	历史纪念空间产生一定的符号性意义→本体性意义+符号性意义→增强的生命力和保护力度或过强的符号性意义→本体破坏的可能	当复兴公园个案被上升到法式园林在上海的风格时，就产生了符号性意义→这种“风格”成为符号，刺激受众产生追忆的情感，公园的重要性随之提高→为了强化这种符号带来的意义，在更新中可能会通过新的设计来增强其风格的表现力，可能意味着本体性意义的损失

3 纪念意义的转变与空间重塑：以复兴公园和霍山公园为例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或政权的交替，社会主体发生变化，纪念空间可能会失去其符号性纪念意义，复兴公园与霍山公园就属于纪念意义转变的典型案例，其在近代时期都被赋予了某种符号性意义，该意义在解放后都被弱化或消失了，后来两个公园又产生了新的符号性意义，但具体的产生过程不一样，且二者的物质本体及其本体性意义也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复兴公园①在原纪念意义弱化后延续其使用功能，随着时间推移积累本体性意义，并因此而获得对本体的保护，同时逐渐产生新的符号性意义，反过来影响保护。霍山公园的本体性意义随着物质本体遭受的改变而反复，其符号性意义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消失后得到复兴，因此而获得受保护的身份以及纪念性空间的重塑。

3.1 复兴公园

近代时期复兴公园位于法租界，建造之初主要是为附近的居民提供一个可游憩的城市园林空间，公园的规则式布局、沉床花坛

① 前文虽然把复兴公园作为历史纪念空间的案例与鲁迅公园进行比较，但近代法租界时期的复兴公园应该同时被归为“有意为之的纪念空间”和“历史纪念空间”。

和玫瑰园等法式园林设计勾起他们对“凡尔赛宫”“杜伊勒里宫”等故乡景物的回忆①[27]。另外，复兴公园是法租界内面积最大的公园，拥有大草坪和宽阔的法桐林荫道，作为每年举办法国国庆庆典和阅兵活动的场所[17]，对当时大部分的使用者来说，复兴公园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纪念性空间。租界收回以后，公园中与法国政治相关的纪念意义随之消亡，与法国乡愁相关的纪念意义也因为使用群体的更换而淡化。

但复兴公园本身所积累的本体性意义却在不断增强并被公众所认识。公园由法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参与完成设计，最终呈现的布局和设计兼融中法传统园林特点和城市公园的使用需求，具有重要的历史见证和艺术、科学、社会价值，是时代背景下一个特殊的园林作品。公园因其迥异于中国传统园林的风貌，一直受到中国民众的关注，是上海向公众传播近代历史信息的一个重要空间，这种后期形成的本体性意义也是复兴公园保持比较完好的历史风貌的原因。

一百多年间公园始终与市民关系密切，许多人在老年时回忆在复兴公园中度过的童年，或在多年后重返时感慨熟悉又陌生的景象，公园本体的保存使不同代际间使用者的记忆得到连续，复兴公园形成了新的符号性意义，即上海记忆，反过来对本体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公园还形成了另一种来自非日常使用人群的符号性纪念意义。他们对复兴公园的风貌印象容易被符号化为具有历史感的中式园林风格与法式园林风格，这种符号比公园本身更能激发人们怀念的情感。在面临更新和保护时，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因这种符号性意义导致公园本体性意义的损失。2006年至2007年，复兴公园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更新改造，设计师对整个设计过程的回顾，从侧面反映了这种符号性意义可能带来的影响。

此次改造中，设计师最初的设计意图是强化建园时的园林理念——中法园林在上海的碰撞和对比，关键是两种风格的边界是如何处理的，是明显的边界，还是模糊的边界。从公园的原有景致来看，两者的过渡并不生硬，为了使中国园与法式园林之间有一个视觉过渡，过渡带使用曲线收边，散植着一片悬铃木，与花坛旁成行的悬铃木相呼应[19]。改造设计师认为，复兴公园在经过多次改动以后，两种风格都有不够突出和纯粹的问题，元素过多，手法比较杂乱，所以在改造中应该对两种风格进行强化和提炼。在最初的竞赛方案中，公园整体布局和园林设计都以恢复强烈的法式园林风格为主，让轴线统领公园整体，中国园成为其中一个区块的园中园。最终实施的时候，并没有采用新的布局，而是保持原有的布局和衔接方式，保留两者之间长势良好的植被，特别是高大的乔木林带（荷池北面和草坪南面）[28]。

中国园现状其实是多个时期设计的产物，除了近代时期形成的水面、假山瀑布、植被以外，还有一个建成于1960年代的水榭，以长廊和亭榭组合成有点有线的流动空间，“采用（当时的）新材料、新工艺，吸取传统手法，创造了新风格的铁制花饰的漏窗、隔断、挂落等装修”[29]，是典型的现代园林建筑的实践（图2-a）。2006年改造设计时，设计师的最初意图是改变中国园的格局以达到更传统的中国园林的效果，但中国园不能整体拆除重建，故修改方案保持中国园格局不变，将水榭按照中国传统园林建筑进行改造②，原因是虽然水榭的“平面布局与空间视线的组织渗透关系较好”，但采用“混凝土构筑，瓷砖、水刷石和涂料饰面”[28]（图2-b），其结构和外形与设计师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园林形象相去甚远。但最终实施时，还是保留了原建筑，仅进行了修葺和立面调整（图2-c）。

最终，法式园林部分没有实施竞赛方案中的大轴线设想，而是通过喷泉、雕塑、座椅等细部的斟酌，月季花卉品种更换以及花坛的设计，在细节上强化了法式园林艺术的表达，新增的花架长廊将月季花园半围合起来，使花园的立体感更强，宽敞的廊下空间则成为很受欢迎的休息场所。

在这次改造中，设计意图和现实的差异体现了符号性意义与本体性意义在公园更新中博弈的过程，加建花架廊是因法式园林而产生的符号性意义对公园的影响，近期可能会使本体性意义产生损耗，但园林特征的强化，在未来也可能成为保护本体性意义的助力。水榭的改造比较有戏剧性，从1980年代[29]和2000年代[28]两个不同文本的评价了解到，早期被认为是新材料、新工艺的设计，在20年后被认为并不符合该处中式园林的理想风格。前者是站在现代园林建筑设计创新的角度来评判，后者是基于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符号化理解而形成的判断，独立来看各有各

① “Why it is a miniature Versailles（凡尔赛宫）...the French park stands as an evergreen monument to the perfect beauty of the Gardens Louis and Marie Antoinette in that distant land...the girl had her glimpse of Versailles, a miniature vista that recalled her homeland...lilting music in the open air that to her brought back to her in a vivid rush of remembered sights and sounds, the dappled shadows of the Tuileries（杜伊勒里宫）...”

② 参看参考文献[28]第56页水榭北立面草图。

的道理，但后来者需要尊重过往历史和已有现实，不同时期的前人的想法都应该被充分考虑。水榭从建成到面临改造已有40多年，不仅本身保留了建造年代的特征、岁月的痕迹，已经产生明显的本体性意义，而且与过去的人、事、公园使用方式持续密切关联，因城市记忆而具有了符号性意义。水榭本体的保存其实是对两种意义的保护，避免出现记忆断层，也是对“上海记忆”的一种延续。

3.2 霍山公园

霍山公园（司德来公园Studley Park，舟山公园）最早作为儿童公园建于1917年，位于二战时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曾经是犹太难民聚会的公共场所和墓园。公园在建国后经历了破坏和多次修复，1997年进行了较彻底的改建，所形成的格局延续至今[18]。

霍山公园纪念意义的重塑从纪念碑树立开始，并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契机。1990年代虹口区政府意识到犹太难民视上海提篮桥地区为“第二故乡”，许多犹太人来此进行寻根之旅，1994年，“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纪念碑在公园中树立[31]。2003年，上海市政府确定了中心城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及范围，霍山公园就位于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的核心保护范围的中心，园门所在的霍山路路段是风貌保护道路，公园东、西、南三面紧邻的都是历史建筑，大门对面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或风貌保存较好的犹太历史建筑。在风貌区规划中，霍山公园被定位为公共活动中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历史空间，认为应该在体现犹太文化方面得到“重建”[32]。

图2 复兴公园水榭北立面
Fig. 2 The north facade of the waterside pavilion in Fuxing Park

霍山公园最近一次比较大型的更新设计工程是在2014年到2015年间完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园绿化效果欠佳，基础设施陈旧破损，部分建筑陈旧、风格凌乱、乱搭建，公园大门与整体环境不融合等问题，同时考虑作为历史风貌区的重要公共空间在增强犹太纪念意义、呼应片区历史风貌上的方法和手段。设计方与相关部门经历了反复讨论修改的过程，早期的方案针对霍山公园表达犹太纪念文化的需求，在设计中融入比较强烈的犹太标志性符号，但经过讨论后认为：符号的使用要慎重，提升纪念意义的表达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公园作为周边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人活动的公共空间，依然以延续社区公园的功能定位为主线；景观营造时应该淡化历史纪念的厚重感，保持社区活动空间轻松与充满活力的氛围①。最终实施时，居民时常使用的健身、交流、休憩的空间，以及游客使用的纪念空间都得到了保留和优化，例如原本三面封闭的休息亭被打开并进行了透光玻璃顶的设计，提升亭子内的光照效果。

纪念性的表达则通过细部设计来达成，例如景观构筑物的形式与材料，运用玻璃、拱形、红色、铁艺花纹等元素进行设计，并适当种植银莲花、油橄榄等具有犹太纪念内涵的植物②，纪念碑所在区域铺装使用油

① 根据“霍山公园改造方案专题会暨评审会”（2014）会议内容总结得出。
② 根据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霍山公园景观设计改造》（2014）内容总结得出。

图3 霍山公园大门形象
Fig. 3 The image of the gate of Huoshan Park

图4 2015年改造前后霍山公园门前街景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the street scene in front of Huoshan Park before and after the renovation in 2015

橄榄花纹环绕设计，提升纪念碑的空间凝聚力。对过往历史和生活点滴的尊重，就是保护本体意义的前提。对本体的长期保护同样能够产生符号性纪念意义，不仅体现为居民日常场所记忆的延续，也体现在前来进行纪念活动的人的场所记忆中。能够预见的是，保存完好的纪念碑、发生微妙变化的环境、能够被感受的纪念氛围等，都会在将来促使纪念碑在原有的犹太纪念意义的基础上增加一层新的纪念意义，即对于纪念碑及其周边环境的历史感怀。

另外，公园大门在2009年到2015年间经历了比较反复的更新过程。根据文献推算，在2009年改造之前，公园的园门是以两片虎皮墙垂直布置，顶上覆以紫藤花架[18]（图3-a）；2009年，园门改造成银灰色框架式[19]（图3-b）；2015年改造成红砖饰面加线脚压顶的入口小建筑和门头（图3-c）。从建筑尺度、色彩材质和细部上来看，2015年改造后的入口与周边犹太历史建筑更能相互呼应和协调（图4）。除了入口建筑以外，公园内的廊架、花架、景观亭、铁艺围墙的改建设计，都在建筑风貌上对犹太纪念进行了呼应。这种由园外历史建筑的物质本体保护而产生的犹太建筑符号性意义，以及从1990年代开始不断壮大的犹太人纪念符号性意义，共同促使公园内犹太纪念空间的重塑。

3.3 复兴公园与霍山公园的比较

将复兴公园和霍山公园的两种纪念意义累积过程按照时间绘制成示意图（图5），绘制的原则是假设在不受到外力干扰（改造、社会环境变化等）的情况下其纪念意义在成型后会匀速增长，当遇到使纪念意义突增或损耗的事件时，就能在示意图中显现出来。

结果显示，复兴公园的本体没有遭到太大破坏，持续累积形成了比较深厚的本体性纪念意义，复兴公园包含的早期符号性意义虽然随着社会环境变更而消失，却因为深厚的本体性意义而衍生出新的符号性意义。与复兴公园相比，霍山公园的本体在不同时期受到的变更较多，没法形成较深厚的本体性意义，但由于公园基址一直保持且作为公园在使用，即使是在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仍能保持一定的本体性和符号性意义，当遇到合适的契机（犹太寻根和相应的风貌保护需求）能够快速形成符号性意义，并利用其重塑纪念性空间。

从纪念意义累积过程的比较中可以知道两种纪念意义在两个公园的历史过程中的变化关系和高低，目前，复兴公园具有较高的本体性意义以及不低的符号性意义，说明它保护状况良好且具有较高的活性；霍山公园具有较高的符号性意义，但本体性意义不突出，说明它具有较高的活性但保护状况一般。

再看两个公园的文保单位认定情况的比较（表3），两个公园都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保护的内容和类型不一样，复兴公园是针对公园整体及重要景点，侧重对本体保护；霍山公园是针对这个场地对历史事件的意义，所以被归为史迹类型，侧重符号保护。

从公园的最近一次改造比较中可以看出改造活动具体如何对纪念意义产生影响（表3）。复兴公园以本体保护为主、风貌（符号）强化为辅，在法式风貌提升的措施中比较谨慎，在确定主角以后通过调整配景和细节来

达到提升的目的；霍山公园以置入和提升风貌（符号）为主，对待主体时保护不是主要目的，但尊重原有社区使用功能和场地现状的做法使主体得到了一定的保留，针对犹太风貌提升的措施相对复兴公园是比较大胆的，主要体现在几个建筑物的重建上，加上公园面积比较小，这种改动使公园整体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复兴公园和霍山公园体现了本体保护好或不好两种典型情况，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园保护对象，其以自身所具备条件，在后续的保护更新活动中发挥各自优势型纪念意义的作用。两者对于符号性意义的合理运用都给公园更新带来了一些远期的价值，但这种运用也有差别，复兴公园需要平衡本体性和符号性的强弱关系，尽量避免符号性在提升的过程对本体性意义造成损害。霍山公园在现阶段对符号性意义的利用是比较充分的，由于改造前的本体不利于符号性意义的表达，所以短期内刚形成的本体性意义再次被牺牲来换取符号性的提升。而在霍山公园更新中，纪念空间与社区空间相结合的目标不仅是对使用现状的考虑，还是对未来本体性意义累积的准备，犹太纪念目的人群和日常使用人群都是这个公园的使用主体，只有保持目标主体的持续使用形成新的记忆和历史，才能为霍山公园累积其独有的本体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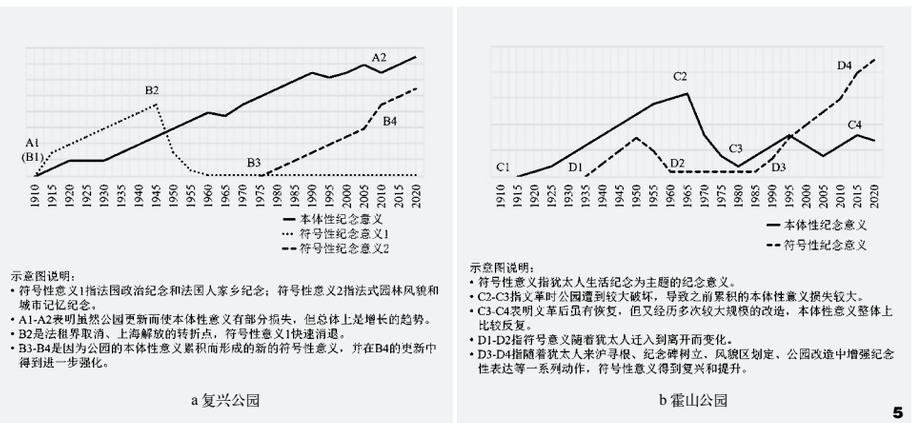

图5 纪念意义累积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ccumulation of commemorative significance

以纪念的视角来分析上海近代城市公园在过去的保护和更新历史中表现出来的特点，这种解读方式尝试将公园的纪念意义向两个方向去溯源。一是因纪念意图而产生的符号性纪念意义，二是在已有的物质空间的基础上，因为本体在历史中的见证作用而具有的本体性纪念意义。在本文中，纪念并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对纪念的理解（通常认为

4 总结和启示

表3 复兴公园和霍山公园的受保护现状和最近一次改造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the protection status and the latest renovation of Fuxing Park and Huoshan Park

		复兴公园 Fuxing Park	霍山公园 Huoshan Park
文保单位认定情况	文保单位名称	复兴公园（玫瑰园、大草坪、沉床花坛、水榭）	司德来公园旧址（二战期间犹太难民隔离区旧址）
	等级	区级文保单位（2009年从无等级升到区级）	区级文保单位（2004年从纪念地转成文保单位）
	类型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近现代重要史迹
最近一次大规模改造	完成时间	2007年	2015年
	布局	基本不变，局部调整	基本不变，局部调整
	建筑物	共10处（中小型建筑和主要的亭廊、大门），其中保留5处，改造1处，拆除1处，新建3处：新建花架廊强化玫瑰园效果、新建音乐亭再现昔日风景、增加休憩设施	共6处（小型建筑和亭廊、大门），其中保留2处，拆除重建4处。重建的廊、亭、花架、大门在设计上呼应片区的历史建筑风貌，提升使用质量
	山水景物	小水面改造、假山瀑布修复	假山移位
	道路地坪	局部路线调整、铺装整修和改造：局部调整修饰道路地坪的走向和边界，平面上强化规则式园林效果	入口局部调整、铺装整修和改造：改造老化铺装、纪念主题区内改造铺装强化氛围
	绿化	调整提升：保留古树、大树，局部调整花卉、小灌木等，玫瑰园品种和配置提升，分别强化法式园林和中式园林的植物氛围	调整提升：保留古树、大树，局部调整花卉、小灌木等，局部增加与犹太人相关的植物品种以呼应纪念主题

纪念空间都是有意为之的纪念），而是认为凡能够引起人们产生“记录”行为和“怀念”情感的都是纪念，以此作为理解历史公园的基础。历史公园作为一种历史公共空间，记录着社会群体的集体造园历史和使用公园的痕迹，也延续着历史上的人、事、社会生活的记忆，因历史记录而产生的纪念性和因精神需求产生的纪念性，虽然有着根源上的差异，但实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

在更新实践中，基于不同的立场或认知范畴，往往容易偏向某一方。例如在符号纪念性比较明显或活跃的案例中，因为符号纪念性带来的政策倾斜、经济引力、社会偏好等优势，推动物质空间的更新以达到更强烈的符号纪念意义的目的，经常会以牺牲本体意义为代价。如果对物质本体采取了有效保护，当社会环境、人的偏好发生改变，符号意义的脆弱和易变性就会显现出来，即被削弱甚至消失，此时历史公园的本体纪念意义就是其达到历史延续的基础。

另一方面，仅保护公园的物质本体容易使之走向博物馆化的道路，这与其持续被使用的特点是相悖的，它应该活跃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有意为之”产生的符号意义以外，还可以从物质本体的历史中挖掘潜在的符号意义，以此在更新中激发历史公园的活力。利用“纪念”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拓展其在历史公园保护和更新中对于纪念意义的理解，充分考虑公园在历史上获得的不同方面的纪念意义，重大或日常的、长期积累或短期形成的、不同人群和立场产生的纪念意义，达到历史信息的保存和代际传播的目的。

在公园更新中强化符号意义可以增强人们对公园的记忆，但同时应该保存物质本体作为历史延续的稳定基础；而在强调物质保存的个案中，不能陷入固定和僵化，应该积极挖掘本体潜存的符号纪念意义，激发公园活力和新的纪念空间的诞生。

参考文献

[1] 李开然. 纪念性景观的涵义[J]. 风景园林, 2008(04): 46-51.

[2] 陈蕴茜. 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 学术月刊, 2012, 44(07): 134-137.

[3] 张红卫. 纪念性景观 基于文化视野的审视[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4] 陆邵明. 浅议景观叙事的内涵、理论与价值[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8(03): 59-67.

[5] 王毅磊, 金麟, 阴帅可, 等. “反纪念碑”纪念性空间考辨[J]. 中国园林, 2021, 37(04): 111-115.

[6] 谭垣, 吕典雅, 朱谋隆, 等. 纪念性建筑[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7] 齐康. 纪念的凝思 齐康纪念建筑设计[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8] 刘腾潇, 王吉祥, 王振, 等. 纪念性场所的空间序列设计策略与实践[J]. 规划师, 2021, 37(S2): 44-49.

[9] 王晴艺, 金荷仙. 纪念性景观在杭州中山公园中的表达[J]. 广东园林, 2019, 41(06): 37-41.

[10] 张清海, 张雨馨. 基于视觉感受的纪念性景观空间序列研究——以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为例[J]. 中国园林, 2019, 35(08): 55-60.

[11] 张红卫, 王向荣. 漫谈当代纪念性景观设计[J]. 中国园林, 2010, 26(09): 38-42.

[12] 胡炜. 纪念性建筑的感性形态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13] 葛晓冰. 城市纪念性空间的叙事学设计方法与策略[D]. 重庆: 重庆大学, 2020.

[14] 陈曦, 张鹏. 为什么我们仍然要阅读里格尔——关于构建建筑遗产价值体系的反思[J]. 华中建筑, 2018, 36(12): 1-5.

[15] RIEGL A, 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1903)[J]. Oppositions, 1982, 25: 31-35.

[16] 陆地. 建筑遗产保护、修复与康复性再生导论[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17] 《上海园林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园林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18]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市绿化管理局. 上海名园志[M].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7.

[19] 惜珍. 梧桐深处的别恋 上海的公园和古典园林[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20]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老公园[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

[21] 沪绿容(2019)156号, 上海市城市公园实施分类分级管理指导意见[S].上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9.

[22] 上海市文物局. 上海3435处不可移动文物名单一览！你家附近有吗？[N/OL]. 上海发布, 2017-07-30[2022-07-19]. https://mp.weixin.qq.com/s/mMX4mP63-auVpfZCw_AADQ.

[23] 沈敏岚. 要否修复上海最早“沙滤水”？[N/OL]. 新民晚报, 2013-05-16[2022-07-02]. http://xmwb.xinmin.cn/html/2013-05/16/content_3_1.htm.

[24] 陈植, 汪定曾. 上海虹口公园改建记——鲁迅纪念墓和陈列馆的设计[J]. 建筑学报, 1956(09): 1-10.

[25] 《园林》杂志社编. 上海的公园[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26] 陆地. 本体与符号——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探源[J]. 建筑遗产, 2021(01): 78-87.

[27] IRENE CORBALLY. French Park Provides Cure For Nostalgia (法国公园治愈乡愁) [N/OL]. The China Press, 1922-07-30 [2020-08-18]. https://www.cnbksy.com/.

[28] 崔文波. 城市公园恢复改造实践[M].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8.

[29] 同济大学建筑系园林教研室. 公园规划与建筑图集[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30] 朱敏彦, 王孝泓, 主编. 上海名园志[M]. 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7.

[31] 单凌. 制造“海上方舟”: 1990年代以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空间的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09): 105-126.

[32] 伍江, 王林. 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与管理上海城市保护的实践[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12: 91-92.

[33] 谢智君. 方舟之路——带你走遍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N/OL]. 虹口报, 2015-09-10[2022-06-23]. http://hongkou-epaper.shmedia.tech/Article/index/aid/347669.html.